

現代漢語詞匯

的形成

——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

〔意〕馬西尼 著
黃河清 譯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y Federico Masini,

translated by Huang Heqing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

——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

[意]馬西尼 著

黃河清 譯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審訂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滬) 新登字118號

責任編輯 徐文堪

裝幀設計 錢自成

Original editio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y Federico Masini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6, 1993, Berkeley, U.S.A*)

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

[意] 馬西尼著 黃河清譯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新華路200號)

各地新華書店經銷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1.375 字數380千字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

ISBN 7-5432-0248-4/H·117

定價: 40.00元

出版說明

意大利羅馬大學東方研究所馬西尼 (Federico Masini) 教授的新著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於1993年作為專題叢書第6種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王士元教授主編的《中國語言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出版。這部書內容豐富, 資料翔實, 考證精確, 對漢語詞匯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問世後受到各國學者的很高評價。

為了使更多的海內外讀者得以利用本書的成果和資料,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約請黃河清先生將全文譯為漢語, 譯筆流暢、信實。譯文經學會理事會主席姚德懷先生審訂, 復經作者本人精心校閱, 稿凡四易。本社在學會支持下, 得到馬西尼教授和王士元教授的贊同, 決定出版這個漢譯本。譯本付印前, 由本社編輯徐文堪先生對照原書再進行了一次校讀, 作了一些修改, 然後由作者最後校正定稿。希望這個譯本能夠對近現代漢語詞匯的研究起到促進和推動的作用。

由於本書的重點是研究大量借詞、譯詞、新詞的引進與創造對於現代漢語詞匯形成的影響, 漢譯本書名改題為《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 特此說明。

由於本書所研究的19世紀漢語語料都是用繁體字印刷的, 漢譯本全書也使用了繁體字, 並承香港中國語文學會提供激光樣。譯本的出版是祖國大陸、香港和意大利、美國有關各方通力合作的結果。我們謹向馬西尼教授、王士元教授、姚德懷先生和各位熱情相助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謝。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7年3月10日

姚 序

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大地經歷了亙古未有的變動，語文也不例外。語文的變化又在不同的名稱上反映出來。我四十年代念小學，當時小學的語文科叫“國語”，後來中學時代的語文科又稱“國文”、“中文”。進入五十年代，“漢語”這個名稱在中國內地用得多了，到了六七十年代，海外又習用“華語”這個稱呼。一物多名、一名多指，是中國國情的特點，但是以上各名稱所指的內涵，相同之中又有不同。

五十年代也興起了“現代漢語”這個名稱，並且有“‘現代漢語’誕生於‘五四’”這個說法。香港中國語文學會（以下簡稱本會）同人，多對這類問題感到興趣，並且認為值得深入探討。但是由於本會會務面廣，到了八十年代後期，才能慢慢凝聚力量，把學會工作之一集中到近現代漢語詞匯的探討上來。一些看法在《語文建設通訊》上顯示出來，另外一個具體的標誌便是1993年《詞庫建設通訊》的創刊。

我們沒有採用純粹研究的方式而採用了出版刊物的方式來進行這項工作，目的是集思廣益，希望通過這樣公開的渠道，讓讀者認識到這個研究領域的重要性，同時也可以汲取海內外反饋的意見。

我們也意識到這項工作的艱巨性。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政局動盪，內戰外患頻仍，更經日軍入侵，繼以兩岸分離，以致文獻資料大量散失。加以人爲的因素，在頗長的一段時間裏研究者連最普通的材料也不一定能夠看到。在台灣，魯迅著作一度是禁書；在內地，胡適的文章也曾屬反動。在這樣的情況下，近現代中國的研究工作難於進行也是頗可理解的。

相反，在國外，關於中國的文獻資料反而更容易找到。這要歸功於許多地區長期安定的環境、高效率的圖書館管理以及現代先進的交通工具和電訊系統。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國外，有關中國的研究常有佳作，也就不難理解了。

本書原著成於1993年。1995年初我看到後，立刻感覺到這是一本觀點新穎、資料詳盡、十分有用的著作。作者的觀點新穎獨特，這在“作者原著序”、“作者譯著序”和本書第142-143頁裏已有說明，不贅。著者的資料詳盡，立論有據，這在書中的內文、注釋、參考文獻中處處顯露出來。作者馬西尼教授是意大利學者，他的嚴謹的治學態度不由人想起了以利瑪竇開始的意大利傳教士和學人的優良傳統。

不久便產生了組織翻譯這本著作的想法。首先，我們幸運地得到了馬西尼教授和原出版者 JCL（《中國語言學報》）王士元教授的慨然同意；與此同時，紹興黃河清先生挑起了重擔，開始了艱巨的翻譯工作。經過一年的努力，初稿、修改稿相繼完成。馬西尼教授十分重視中譯本的出版，對譯稿進行了細心的校勘。製作方面，本會王愛莉女士一開始就承擔了整個工作：排字、多次耐心的修改，以及細緻的分版。翻譯出版學術著作是一項艱巨的工程。本書成書的各個階段：初譯、修改、審校、製作，各位參與者雖是苦樂自知，但是整個工作應該說還是相當順利的。我們很幸運，在精神上和經濟上也得到了本會名譽會長李業宏先生的有力支持。

我們的原意是在香港出版這本譯著。1996年7月，上海徐文堪先生得知我們的出版計劃後來信說：“Masini 博士的書，有很高的學術和資料價值，並在相當程度上填補了前此研究的空白，所以非常希望能在內地出版，以便讓更多讀者能夠讀到。”我們十分同意徐文堪先生的看法。因此，雖然意識到這將會拖延原來的出版計劃，

但是覺得也是非常值得的。在再次得到馬西尼教授和王士元教授同意的同時，我們也很高興地得知，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已經願意出版這本譯著了。在最後階段，徐文堪先生還通讀全書，並且提出了不少改進建議。

前後兩年多的時間，通過大家積極的努力和親密的合作，這本譯著終於即將出版了。我在此謹向各有關方面致以衷心的感謝，同時相信，這本譯著將會起到它應有的作用。

姚德懷

1997年3月8日

序於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譯者說明

1995年2月，受香港中國語文學會之托，我開始翻譯 Masini 教授的這本書。在翻譯中，我深為作者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所感動。毫無疑問，作者是花了很大心血的。對於這樣一本著作的翻譯，我未敢草率從事。我一邊翻譯，一邊研究。作者書中經常提到的一些晚清使西遊記，我也拿來閱讀。碰到一些疑點，還常與作者商榷。

同年6月，第一譯稿結束。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王愛莉小姐將這部38萬字的譯稿輸入了電腦。然後，我在電腦清樣稿上開始了第二譯稿的工作。

第二譯稿的工作十分繁重。除了要修改第一譯稿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原著中有不少摘自各種漢語文獻的引語。這些引語作者均譯成了英文。對於這些引語，我們是直接去查漢語文獻，找出有關段落，配在譯著中相應的地方。原著中這類引語的數量很多，又都分散在各種書籍中，因此，第二譯稿一直到1996年2月才完成。作者對第二譯稿作了仔細校對，並作了增刪。例如，在書後的詞表中，他刪去了一些條目（如“大噴炮”、“蕩機”等），同時對有些條目作了改寫，增補了一些內容（如“公司”等）。所以，譯著在有些地方已與原著不同了。

1996年8月至9月，我對作者修訂後的譯稿（第三譯稿）再次作了校對、通讀，形成了第四譯稿。姚德懷先生對第四譯稿作了最後的審校。其實，在第一、二、三譯稿中，姚先生也作過一些修改。

本書原定由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出版。1996年6月底，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徐文堪先生獲知此書已基本譯成，他寫信給我們，表示希望此書能在上海出版。在如今出版學術著作很不景氣的情況下，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毅然決定出版此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徐文堪先生為推動中國漢語研究的發展，力薦出版此書，令人欽敬！

現將譯著中的有關事項說明如下：

1. 原著中提到了不少來華傳教士，他們大多有著自己的漢名，也有些人的原文名字有著習慣的譯名。因此譯著中對這些人士的原名不另作新譯。這些漢名和習慣譯名在譯著中第一次出現時，我們在括號中附有原名，但以後再次出現時，原名不再附注。讀者若要進一步了解，可查閱書後我們編輯的附錄4“來華外國人名漢英對照表”。

2. 譯著正文中參考文獻的附注檢索法是從原著中移植過來的，使用時很方便。這種附注是簡略式的，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 a. “在吳方言區，‘白話’是一個動詞 (Min Jiaji, *Wufangyan cidian*: 60)。”

例 b. “Pittau (*Meiji*: 14-15) 說，1861年，日本出版了《聯邦志略》。”

在例 a 中，“Min Jiaji, *Wufangyan cidian*”可在書後的“參考文獻”中按字母順序查到，這是漢語拼音，即“閔家驥，《吳方言詞典》”，它是一種簡寫形式，作者姓名、書名全稱及有關情況可在“參考文獻”中同樣形式的“Min Jiaji, *Wufangyan cidian*”條的下面查到，即“閔家驥、范曉、朱川、張嵩丘，《簡明吳方言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上海，1986年”。“*Wufangyan cidian*”後面的“60”，表示頁數。例 b 也是這樣，只不過它是英文書名的簡寫形式，其全稱及有關情況也可在“參考文獻”中按字母順序在同樣形式的“Pittau, *Meiji* 條下找到。

3. 在翻譯中，我們發現原著中存有一些錯誤和印誤，徵得作者的同意，在譯著中作了訂正。我們還加了一些譯者注。

4. 整理索引時，得到了陳忠藕先生的協助，在此謹對他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我還要感謝我的妻子姒惜陰和女兒黃姒，她們在整個翻譯過程中曾給我多方面的幫助。

囿於本人的學識，譯著中的錯誤在所難免，有望讀者批評指正。

黃河清

1996年9月15日

作者譯著序

作爲一個研究漢語詞匯的外國人，在看到有中國學者把拙著譯成漢文出版時，我是感到十分欣慰和榮幸的。在此，我要衷心感謝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理事會主席姚德懷先生和該會會員黃河清先生：是黃先生的生花妙筆，爲拙著增色不少；是由於他們二位的無比勤奮，才使本書得以早日與中國讀者見面。

本書所研究的現代漢語詞匯之時間範圍，下限是1898年，即“百日維新”前後。我現在採用同樣的方法，開始對1898年至1919年期間漢語詞匯的發展趨勢和演變情況，做進一步的探索；並準備從語言學角度，對現代漢語的形成是始自“五四”運動的這一傳統觀點，進行重新評價。

借此機會，我還要向幾位對拙著曾熱心做過評介的同行們，表示敬意。他們是：

Giuliano Bertuccioli, 其文載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1993年, 第67期, 3-4冊, 第383至384頁。

Piero Corradini, 其文載 *Mondo Cinese*, 1994年第85期, 第75至76頁。

《中國科學史通訊》, 1994年第8期, 第94至97頁。

Zdeňka Heřmanová-Novotná, 其文載 *Archiv orientální*, Praha 1994年, 第62-3期, 第360至362頁。

Viviane Alletton, 其文載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 1995年, XIII期, 第302至303頁。

《詞庫建設通訊》, 1995年, 第6期, 第64頁。

趙艷芳，“西方語言文化對現代漢語詞匯的影響——《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及向國語的進化：1840-1898》評介”載《國外語言學》，1996年，第1期，第42至47頁。

Chu-ren Huang, 其文載 *The China Quarterly*, 1996年，第145頁，第230至231頁。

Koos Kuiper, 其文載 *T'oung Pao*, 1996年，LXXXII期，第510至514頁。

馬西尼

1996年7月15日於羅馬

作者原著序

雖然中國在詞典編纂方面有著悠久的傳統，但是我們對近代漢語詞語的詞源卻知之甚少。因此，在從事此項研究時，我的目的是：確定1840至1898年間詞匯嬗變的本質和特徵，同時還要表明，現代漢語詞匯不僅僅是20世紀初那場文學運動中語言實驗的成果，而且事實上它的發展還得益於漢語的傳統基礎以及19世紀新詞的作用。

首先我假定：語言是外界刺激的反應。在這個前提之下，我特別注意外國人或與外國人有接觸的中國人用漢語寫的那些著作對漢語詞匯的影響。西方語言對漢語詞匯的影響可能只是間接的，這種影響是通過創造意譯詞和仿譯詞而產生的，因為漢語吸收音譯詞很困難。日語對漢語的影響更大，雖然在組合詞語時有著差異，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講，日語和漢語具有相同的文字形式。

正是因為日語詞匯在20世紀早期對漢語有著如此強烈的影響，所以我決定將自己研究詞匯演變的下限時間限制在1898年。20世紀初，無數中國學者和學生旅居日本，這為漢語詞匯開拓了新途徑。但在本書中，我所討論的日語對漢語的影響，只到1898年為止，因為，對於1898年以後的詞匯演變情況，我希望能另行研究。

對於用來論證的材料，我不得不作出明確的選擇，因為這類材料實在太多了。我篩選掉了大量原始資料，甚至在那些選定的資料當中，我還篩選掉了許多不能用來研究的詞語。當然，這並不是說，我的研究已經完美無缺，而我只是希望在這個值得重視然而至今很少有人研究的領域中，在進一步提供有關知識方面，願此書做出它的貢獻。

本書分為兩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考察了與西方、日本知識傳播有關的歷史、政治和社會事件。在第二部分中，我從純語言學

的角度，觀察了第一部分所述事件對漢語詞匯的影響。

書後有3個附錄（原著只有3個附錄。譯著中的“附錄4”為譯者所加——譯者注）。“附錄1”中有一個表，表中是19世紀出現的化學元素的各種漢字符號。這是通過創造新字來創造新詞的唯一例子。“附錄2”中有一個新詞詞表，表中包括我作過檢定的新詞。

“附錄3”是“附錄2”中所收詞的列表，表中依每個詞的英語對應意義和日語讀音排列（日語羅馬字用斜體排印）。

我採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使用的漢語拼音方案。對於方言詞語，我用的是以下詞典中的方案：粵語是饒秉才等人的《廣州話方言詞典》（Rao-Ouyang, *Guangzhouhua cidian*），吳語是閔家驥等人的《簡明吳方言詞典》（Min Jiaji, *Wu fangyan cidian*）。日語單詞的羅馬字母轉寫，採用了 *Kenkyusha's New Japanese-English Dictionary*（1974年第4版，東京）中的黑本式轉寫法。

此項研究工作是我於1987年在北京開始的。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十分榮幸地得到了羅馬大學 Giuliano Bertuccioli 和 Tullio De Mauro 兩位教授的指導、支持和關心。對於他們兩位，我要表示深深的謝意。

我要感謝那不勒斯大學東方學院（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東方學博士研究生導師 Lionello Lanciotti 教授，他曾給予我熱情的支持，並且准許我從事這個博士研究課題。

我還要向美國伯克利市加利福尼亞大學王士元教授表示謝意，由於他的同意，本書才得以在《中國語言學報》上作為專題著作叢書之一出版。這本著作的出版，也要感謝意大利 Consiglio Nazionale delle Ricerche 提供的資助。

最後，我要感謝 Margaret Cook 對我這種“洋涇浜英語”的修改！

目 錄

出版說明.....	i
姚序.....	ii
譯者說明.....	v
作者譯著序.....	viii
作者原著序.....	x

第1章 1840年至1898年的語言和歷史

1.1 十九世紀初中國的語言狀況.....	1
1.2 與西方接觸中的語言問題.....	5
1.3 翻譯先驅：林則徐、魏源和徐繼畲.....	18
1.4 從廣州到北京、上海	
1.4.1 新教傳教士和太平軍的翻譯.....	40
1.4.2 早期的語言學校.....	47
1.4.3 北京同文館的譯著.....	51
1.4.4 早期中國訪問西方的外交使團.....	61
1.4.5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在上海的譯著.....	66
1.4.6 上海製造局——科技詞匯的形成和傳播的搖籃..	72
1.4.7 從科學到政治：康有為、譚嗣同和梁啟超.....	84
1.5 漢語對日語詞匯的影響.....	98
1.6 來自日本的影響	
1.6.1 十九世紀的日本.....	104
1.6.2 中日首次直接接觸的兩個人：羅森和柳原前光	106
1.6.3 外交官、旅行者和商人.....	108
1.6.4 傅雲龍和黃慶澄.....	113

1.6.5	十九世紀末日本知識的傳播人： 黃遵憲和梁啟超.....	117
1.6.6	學習和翻譯日本著作.....	123
1.7	新國語的誕生.....	130

第2章 一些詞匯現象

2.1	從單音節語言發展到多音節語言.....	144
2.2	借詞和新詞	
2.2.1	借詞、新詞的分類以及分析.....	153
2.2.2	音譯詞和混合詞.....	161
2.2.3	仿譯詞和意譯詞.....	169
2.2.4	1900年以前的日語漢字借詞.....	175
2.2.5	新詞.....	182

附錄

附錄1	漢語化學元素名稱對照表.....	185
附錄2	十九世紀文獻中的新詞詞表.....	188
附錄3	詞表中的英日詞語索引.....	275
附錄4	來華外國人名漢英對照表.....	293

參考文獻.....	296
中文索引.....	335
西文索引.....	346
原作者小傳.....	348

第 1 章 1840 年至 1898 年的語言和歷史

1.1 十九世紀初中國的語言狀況

自 1644 年開始統治中國的清皇朝，它雖然維護了歷朝的行政體系，但卻在朝廷強制使用滿語、蒙古語和漢語。然而隨著時光的流逝，這種官方的多語言政策逐漸受到削弱。到了 19 世紀初，漢語又取得了以前的地位，成為最習用的語言。因此，漢語成為官方語言，全國通用，而滿語和蒙古語只局限在宮廷及旗人中使用。在京城，漢語是中國政府官員使用的正規語言，只有在事關滿族或蒙古族時，文件才譯成滿語或蒙古語。

在清朝，對做官取仕有著傳統而嚴格的考試制度。科舉考試分三級：鄉試、會試和殿試，其考試的全部內容都基於文學和哲學典籍，即《四書》、《五經》以及哲學家朱熹的《四書集注》。

作文時，考生在形式結構和文體風格這兩個方面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眾所周知的“八股文”必須由起股、中股、後股和束股組成，每股都得寫上排比對偶的句子¹。從語言學上講，這種文體是形式化的、模式化的，它以先哲的語言為基礎。清朝官員在他們的官方文件中也使用這種文體（即後來所謂的“文言”），但常有著更多的官樣文章色彩。

雖然考試一直是純文學上的測試，但實際卻是語言上的測試。考生必須表明他們對傳統文化了如指掌，同時還必須顯示，他們對傳遞了許多世紀的中國文化的語言是何等的運用自如。在中國這樣大的國家裏，口頭方言如此紛繁，很顯然，需要有一種通行於整個行政區域的書面語。

1. 這種形式結構在明成化年間（1465-1487）由官方確立。參閱 Zi, *Pratique des Examens Littéraires en Chine* : 7。關於科舉制度的綜述，可參閱 Miyazaki, *China's Examination Hell*。